國家發展研究　第七卷第二期
2008 年 6 月　　頁 3-28

自反而縮：「文革」與日本中國研究學術社群的主體建立

邵軒磊*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 邵軒磊，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研究領域為東亞政治、中國大陸研究，通訊處為 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電話：0911899262，E-Mail：93260505@nc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摘要

自 1962 年福特基金會事件之後，日本中國研究界注意到自我反省的意識，帶來了一波「學術社群的主體性何在」的思維。而隨著文革運動氣氛而逐漸昇高，此一思維轉變為整個日本中國學界自我批判與左翼革命思維高峰。本文從「自我主體性」的觀點，以當時的研討會與代表性著作為研究資料，發掘當時的中國研究者的思想系譜，是將中國文革放在什麼樣的脈絡下來理解。在這段時期的主要特色是：知識論上的主體反省，藉由社會運動與研究者生命歷程結合，而且文革對於日本研究者的意義並非固定，而是在歷次事件中都有改變。研究者逐漸從「我與中國的關係為何？」的問題轉變為直接研究「中國是什麼？」，並由此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本文以此視角貫串，將此一歷史嵌合進入中國研究界 1962 年的福特基金會事件，以及 1970 年代末開始的「再評價」運動之中。瞭解這波造成整體日本中國研究界甚至整體思想界至今社會主義最大的高峰，不僅能對整體日本中國研究做出瞭解，更能對現在的日本民族主義思維有所認識。

關鍵詞：現代中國研究系譜、學術社群、文化大革命、主體性、
戰後日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研究背景

日本中國學界延續安保運動所提出的研究方向轉換問題[1]，在 1962 年福特基金會事件[2]之後，更開始了一波學術社群必須加強自我反省的主張。[3]這個主張與運動隨著文革發展而逐漸昇高，終於到達整個日本學術中國社群的自我批判運動與左翼革命思維的高峰，以 1971 年由朝日新聞社所召開的座談會「中國研究者的自我造反與自我批判」[4]做為代表。學界各個群體也在此時分裂與展開激烈論辯。文革結束後數年間，戰後的主流研究視角——革命史觀[5]逐漸消失，同時日本研究者對於從前中國的觀點與研究幾乎失去信心[6]，從而在 1980 年代展開了一波「再評價」風潮，並隨之提出種種新的亞洲／中國思維。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

---

1 安保事件對史學界的變動有三方面：一、從「一國史」的思考模式進展到「東亞甚至是全球」的史學；二、「人民鬥爭」從觀念論到具體的研究；三、經濟史的研究焦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研究」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自身轉變方式」的研究。（柴田三千雄，1977：498）

2 原文為：アジア、フォード財団事件，又稱亞細亞財團／福特財團事件，以下簡稱「AF 事件」。指的是「在 1962 年 1 月到 7 月時，日本的中國研究者之間，發起了對於美國的亞細亞財團／福特財團的現代中國研究計畫的批判運動。」（山根幸夫，1983：503）簡單的說，是美國以鉅額金錢補助日本的中國學界，造成日本研究者對此感到憂心，認為美國「意圖不軌」。其中，福特財團主要是針對東洋文庫（中國研究部分），而亞細亞財團主要針對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亞洲發展中國家及東南亞部分）補助，因此日本學者討論這個事件時，並稱其為「AF 事件」。此一運動可說是日本中國研究學術社群最重大的政治社會運動，也被認為是 1960 年安保運動的延長。

3 同時社會上也有對於「近代化史觀」的反省風氣。由於在 60 年代所出現的公害問題，使得社會上對以工業化為主軸的近代模式懷疑越來越多，甚而帶來了對「近代主義」發展觀的批判。當時針對「近代化不等於進步」的觀點，提出只用「變動」（changing）來理解。（山室信一，2004：26）

4 原文為：中国研究者の造反と自我批判。詳細的紀錄，於當時的《朝日雜誌》揭載，請參閱 Mark Seldan 等著，1970：17-25。

5 革命史觀簡言之，就是依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史觀模型，說明中國的歷史方向。中國到清朝為止是封建社會，中華民國是半封建社會……而與前兩者對立的現代中國是「正確」的。（國分良成，1995：1396-7）

6 山田慶兒在 1967 年的《日本中的亞洲、非洲研究現狀與課題》（日本におけるアジア、アフリカ研究の現状と課題）中，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當時的《中國學研究者》對於現實認識的程度之低，令人驚訝。」（引自山根幸夫，1983：4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著眼於日本學界在文革氣氛帶動之下，所發生的反省與主張其中的「主體性」，尤其以戰後第二代的學者的觀點而言：文革是讓日本反思「亞洲能不能自我變革？」的同時，也帶有對日本自身命運的自憐與對現狀打破的渴望。（野澤豐：1998：115）深究此言背後的意義，正是作為日本自身主體性的建立以及學術要如何研究的重要思維歷程。

因此，本文從福特基金會事件落幕之後的 1963 年開始，闡述之後的文化大革命、學界自我批判風潮與學術社群分裂等事件對日本學界帶來的影響。綜觀而言，在文革的衝擊下，日本社會上爆發了最後一次大型學運（1969 大學占領事件）；而同時戰後第一代研究者也於文革後期開始告別人世，逐漸進入世代交替。以此帶出其中 10 餘年間學界與此對應的自省與思想的轉變，並以「主體性」概念為核心整理出文革時期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思想系譜。本文指稱的主體性，是以「需不需要他者證成」做為基準，也就是說，在中國研究者敘述中國的時候的重要參照點是「我（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亦或是能夠「直接描述中國」的兩種不同的思維，代表著「自我存在」是否已經確立，也就是主體性的「從無到有」。在之後的文獻分析中，將處處能夠看到研究者對於此種研究前提的轉向。瞭解這波造成整體日本中國研究界甚至整體思想界對於主體思維最大的高峰，才能對現在的日本民族主義思維有所認識。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架構

本節藉由對「文革時期日本學界」研究文獻的回顧，來說明現今文革對日本學術界影響的普遍性看法。首先從研究方法的變化來看，中國研究的知識論問題有兩期的轉變：在文革之前主要是從「意識形態途徑」，也就是將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為與政策都歸類到社會主義進程中解釋。甚至把「新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在亞洲的實現，並加以無條件的支持與讚美。（姬田光義，2000：21）直到 1970 年代之後中國政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身否定文革，由此研究者對於中國與中國革命能夠客觀看待，把中國當成「普通」的國家，回到了普通外國研究的基礎上。（伊藤一彥，1990：3-4）而進一步在立場上，久保與江田也強調意識形態的對立面[7]。從以上關注研究方法的文獻指出：日本學界在 1960-70 年代達成了研究方法的轉變。

轉變的過程關係著學術社群之間的論爭。既有的文獻指出，戰後日本中國學界長期以來分為兩派，一方堅持科學與客觀中立研究，而另一方更強調中國研究的目的性與道德性，兩者間針鋒相對，經過一個時期[8]的分裂與混亂。（久保亨、江田憲治，2006：264）姬田也指出「1949-66 年時期是屬於不滿冷戰體制下的中國宣傳，而認為必須教育人民的一群人，與強烈反對這種論點的人的極端狀態。」（姬田光義，2000：21）尤其是文革時期「不僅政黨與大眾團體產生分裂，就連研究團體內部也產生分裂。」（里井彥七郎，1967：741）野澤的著作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分裂與對立」所造成的遺憾，諸如野澤提及：在文革中研究「組織分裂」的情況下，對新興理論並無共識也缺乏相互的討論，也因為學問見解與政治立場不一樣，也造成了感情對立。（野澤豐，1985：10）甚至影響到 AF 事件中達成共識的國際交流三原則[9]也呈現無法進行的狀態。（野澤豐，1985：5）

---

7 「（1970 年代之前）是由兩種對立觀點組成，一方對革命有著感情，研究重心放在作為革命中心史觀的中國革命史，對於封建制開始到資本主義，接下去到社會主義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階段論，也就是對所謂的蘇聯社會主義的進程認識而存在。另一方則是納入美國的中國研究手法，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支配特質加以考察，對中國的經濟實態做出數量（量化）把握的調查研究，此種把握的形式基礎，通常立基於對於歐美的近代化過程與社會發展的模型與意識。」（久保亨、江田憲治，2006：264）

8 尤其是在在「中國文革混亂與美國對於越南『侵略』（原文用語）失敗後，直到 1970 年代末期開始急速轉變。」（久保亨、江田憲治，2006：264）

9 在 1962 年 5 月所召開的歷史學研究大會表達了反對「東洋文庫現代中國研究」接受福特基金的聲明；同時《歷史評論》也以特集的形式刊載了反對的文章。並以「學術民主」為由，號召舉辦研究會邀請正反雙方一起討論。並做成了有關學術國際交流的三個決議：「自主對等、不妨礙與其他國家交流、計畫內容成果公開」三項。（歷史學研究會，1962：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有文獻將其歸因於「支持／反對」文革的脈絡：「對文革的不同看法，使日本的中國研究隊伍出現了嚴重的分裂，這種分裂後來擴大成為政治立場的對立和人與人的對立，危及了研究人員共同對話的基礎。」（何培忠，2002：111）。[10]嚴紹璗的文章中討論到支持與反對的原因，分別為：贊成者有：「一、在理論上信仰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充滿了信仰[11]；二、從自己生存的實際情況出發而相信文化大革命[12]；三、少部分極端的個人集團者、投機取巧者與謀取私利的集團。」（嚴紹璗，2005：5）反對者則是：「一、執著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或文化人[13]；二、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比較瞭解的學者[14]；三、對中國革命精神感到恐懼的日本人[15]；四、長期敵視中國的日本人[16]；第五種反

[10] 「現代中國研究者中對文革持肯定態度的人占多數，他們由於對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封閉狀況感到失望，而寄希望於中國來打破封閉，將紅衛兵對幹部和學術權威的批判理解為對官僚主義的批判。（何培忠，2002：111）另一方面否定文革的人認為，文革過於強調階級鬥爭，紅衛兵運動是將毛澤東絕對化。而與反右鬥爭時相同甚至是進一步擴大化。」（何培忠，2002：111）然而，對於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甚至影響學界達十數年之久，有必要進一步說明。

[11] 一些知識份子在年輕的時代就是在日本以及世界從事馬克思主義的運動，並且曾經為馬克思主義理想在國內和國外堅持過抗爭或進行過鬥爭。但是他們沒有在日本實現馬克思主義，卻在中國看見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的誕生，所以他們認為中國是馬克思主義成功的實例，並幻化成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嚴紹璗，2005：4）描述的是支持革命史觀的心情，但對此評價為「然而他們沒能瞭解中國歷史的複雜性，也沒有能夠瞭解中國革命進程的複雜性。他們嚮往中國的道路卻沒有能夠完全理解中國的道路。」（嚴紹璗，2005：4）

[12] 而有很多日本人對自己生存的現實和日本的教育制度不滿。他們從中國的革命中看到了很多新鮮的因素。……他們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本身，卻從革命的表層看到了與自己的情緒相契合的某些成分。（嚴紹璗，2005：5）指的是對於現狀不滿而藉由文革發洩的一群人。

[13] 他們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以文化為革命的目標，他們感到非常不理解，而且感到非常反感和憤怒。（嚴紹璗，2005：5）指的是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喜好的人。

[14] 他們在自身的生存過程中，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有很多的把握。他們認為這個革命是假借文化而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而在革命進程中間又對中國的許多優秀知識份子加以政治迫害。（嚴紹璗，2005：5）

[15] 日本長期以來對中國有一種恐懼感，他們覺得一個強大的中國必然會對他們造成威脅。中國的文革是以非常「革命」的姿態，把自己作為全世界革命聖地表現出來，有些日本人對此有一種非常恐懼的感覺。（嚴紹璗，2005：6）

[16] 比如當時由日本的國會議員們組成的「青嵐會」之類。……他們對於中國發生的任何事情都要非議，都要反對抨擊。他們是一批敵視中國的「職業反華」的日本人，（也就是）具有日本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以及日本皇國國家觀念的分子。（嚴紹璗，200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者是日本共產黨[17]。」（嚴紹璗，2005：6）也就是說，支持或反對者藉由文革議題表達自身的政治與利益主張。茲將既有文獻回顧以表一做出說明：

表一、研究文獻中對文革時的日本學界氣氛轉變的解釋

主要視角	代表文獻／寫作年代	文革對日本的影響
研究方法的轉變	伊藤／1990；姬田／2000；久保、江田／2006	主流研究方法由意識形態研究轉為實證研究。
研究團體長久以來的對立	里井／1967；野澤／1985；姬田／2000	戰後以來研究者對中國的研究感情的對立。
對文革的支持與反對	何培忠／2002；嚴紹璗／2005	以文革為中心，支持與反對的意見激化。

資料來源：由作者自製。

這三種解釋方法不一定是對立的，更多是呈現互相補充的情形。由以上的文獻回顧中，讀者能夠對文革時期的日本中國學界建立基本的圖像，也能瞭解到這段時期所產生的衝擊甚大，足夠作為一種歷史轉折點。但既有的文獻的解釋途徑有所不足，如：雖然能夠理解成支持與反對兩種觀點，但是這兩種觀點如何呈現？或是說如何放在整體知識社會學脈絡中理解？雖然有論者指出表述意見的成員的多樣性的理由與多

[17] 從日文的文獻中有如下說明：1966 年 3 月日共領袖宮本顯治率領日本共產黨代表團，前往北京，意圖結成「反美帝侵略越南國際統一戰線」。但當時中共內部毛派與劉鄧正在激烈論爭，毛主張要「反美反蘇國際統一戰線」，日中因此不合。（參考小島優編，1996）而對於日中關係也產生影響，之後日中貿易促進會、亞細亞通信社解散。日中友好協會（親日共）與中國研究所（親中共）也因此分裂。自此，日本的中國研究又細分為親中共與親日共兩組。（山根幸夫，1983：504）這樣一來，社會主義者也不完全是站在同一陣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立場（嚴紹璗，2005：5-6），然則大部分都具有現實主義色彩，也就是說，認定其為利益的視角是「現在的立場」，然而放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下能否如此理解？[18]其次，有竹內好等人的「中國文學研究會」研究中國文學哲學，屬於對中國傳統文化十分熱愛的學者。但與預期相反的，竹內對文革強烈支持，野澤認為他們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強烈。（野澤豐，1985：21）這樣一來，支持文革是不是「傳統文化人」的行為？或是什麼才是認定「執著文化的學者」之標準？很容易變成循環邏輯[19]。對於研究視角的轉變與研究團體的對立，則屬於現象描述性，使人想深入研究其內部動力與效應。

綜上所述，目前對於「日本對中國文革認識」此一議題，目前還是存有許多值得研究的空間。本文提出「主體認識」的觀點，將文革中日本學界的「自我批判」浪潮，結合 1962 年福特基金會事件的主體性反省浪潮，甚至上溯到戰爭結束以來，一直沒有處理的戰後心理重建[20]的問題。本文以當時的研討會與代表性著作為例，發掘當時的中國研究者，是將中國文革放在什麼樣的脈絡下來理解的？而且與研究者的生命歷程產生了什麼樣的互動？在自我反省批判過程中將知識論上的主體反省，整個上升到社會運動，甚至是研究者的生命歷程之中，而且藉由中國文革作為標的開展。較諸以往對於文革影響的觀點，本文的「主體論」能夠將這段歷史嵌合進入中國研究界 1962 年的 AF 事件，以及 1970 年代末開始的「再評價」運動之中。

---

[18] 如前文所指出的「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和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比較瞭解的學者」，現在看來可能合理的論述，但放在當時的脈絡中則很難具體理解。

[19] 意思是說，並非由「不執著／執著」傳統文化來看「支持／反對」文革立場，而是由「支持／反對」文革立場來斷定「不執著／執著」傳統文化。

[20] 子安認為「日本對戰後的處理是以美國為核心進行的，這也使得日本對以亞洲為戰場的這場戰爭發生了誤解，而自己親手封住了根本改善與亞洲關係而重新發展建設的戰後日本道路。戰後不久出現了冷戰格局促使以對美關係為中心的日本急於完成對日後的處理。」（子安宣邦，2004：14）而擴大來看，其中非但沒有與亞洲國家間進行足夠的對話，甚至在日本國內自身的思辨都可能不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學界的主體性意識

戰後到 1960 年代為止，日本史學界長期壓抑的「研究與研究者的關係」問題，最早在 1962 年 AF 事件開始逐漸被意識，到文革時到達最高點。首先在 1960 年代開始，日本受美國的區域研究[21]影響，開始以國家為單位進行研究，同時研究結果有很高的政治色彩。[22]在 AF 事件中，日本研究者對美國試圖使用金錢補助支配日本學界，甚至影響研究成果的行動為發端，對於研究者的「主體性」開始討論。AF 運動最終並沒有真正達到斷絕美國金錢援助，但代表的是，學界開始意識日本戰後長期沈潛的主體性與中國研究問題。在 AF 事件中，論述的策略是將美國比喻為日本舊帝國（蠟山芳郎，1966：120）並且意圖侵略亞洲，從而以「和平」作為主要觀點來反對美國補助。[23]但在 AF 事件的討論裡，以否定美國的方法並無法真正處理發展的價值問題，在文革開始之前這種困惑與整個中國研究在方法上的心理困境，表現整體學界研究方法的不足，以及呈現出兩極化評價的價值對立現象。[24]

具體而言，除了提出原有理論的侷限性[25]之外，更要求研究者要有廣大的問題意識，諸如「1.中國史要如何作為日本學問而確立；2.中國

---

[21] 區域研究在當時也是以以歐美為中心編成的「近代」作為背景而生。（原洋之介，2003：11）

[22] 初期的區域研究，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有高度的不對稱性，對做為對象的區域情報蒐集並且「研究文化類型」的區域研究，作為一種學問體系，是含有高度政策目的性的實務研究。（原洋之介，2003：11-12）

[23] 蠟山指出：「從 1951 單邊媾和與日美安保開始，到 1952 年日華（台）講和，1953 年日本經濟恢復戰前水準，使得政經界乃至一般社會，『皇國主義』有復興的趨勢，但並未跟亞洲有來往，成為「脫亞」的戰後版。但不一樣的是，日本是做為美國的一部份對於亞洲（朝鮮、台灣、東南亞）滲透影響力。」（蠟山芳郎，1966：120）在這裡的說法中，表現了日本對於自己是否作為主體的高度敏感性。

[24] 當時對史學界的評論可體現當時研究視角與方法的不足：當時日中關係方面「政治史」與「思想史」截然二分的兩群研究。思想史研究的特點在於想要設定「日中關係的思想座標」；而政治史則是在既存的價值上，停留在反省侵略惡行與日中友好的範疇之上。（矢澤康佑，1962：673）

[25] 在從山本針對史學會創立 75 以年以來，對史學界研究的觀察歸納發現：1.日本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如何跟世界史理論與課題做出連結；3.中國與其民族的歷史發展內容為何？」（佐伯有一、加藤祐三，1965：725）表現在 1966 年對總體亞細亞史觀的再思考問題，由當時的重量級學者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三人主編了《歷史像再構成の課題》（1966），其中對於「亞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研究方法的演變、日本人的中國觀」三個主題加以討論。可以發現日本知識社群在重要事件發生的時候，就會關心原本自己視角的正確性，而要求對研究對象的再定位，背後代表的正是對自身的再定位。在這些問題意識的背後，雖然隱含著要求對提出問題的主體加以思辯的動力，但不論是形式或是要求的答案，都在試圖回答「中國與我有什麼關係」，也就是處理主體的存在與中國的合一／分離問題。

在方法論上，部分學界人士嘗試引進科學與客觀主義。從 1964 年開始日本國內設立以民族學為主要研究途徑的「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26]。對此山本特別提及「一方面感到期待多方面的合作能使歷史研究者的視角多元化，但二方面也擔心『政治邀請』與『學術社會實踐』邊界不明會使歷史學喪失價值。」（山本達郎，1965：498）從山本的說明中可以感受到當時日本研究者的困頓與掙扎[27]，想要尋求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時

與東洋史學者缺少理論，而西洋史學者即使有理論，也是套用西方本來的理論。2.與國外相較，日本的史學研究種類太少，軍事史、海事史、科學史、技術史、思想史、文化史都不流行，而以社會與經濟史為研究大宗。3.與其他學科的連結太弱，對歷史學體系化有很大影響。（山本達郎，1965：498）

[26] 原文為：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簡稱 AA 研，設立於東京外國語大學內，而目標是作為跨學科領域與跨區域，而能提供日本國內與海外研究者研究資源的場所，請參考 http://www.aa.tufs.ac.jp/aa03_aa_overview_j.html 的說明。當時對於區域研究（日文：地域研究）一詞雖已經被學界接受，但 AA 研特地使用了「共同利用」一詞，但內涵與現今學界的區域研究理念完全相同。意指同時具有人文科學系與社會科學系特色的研究，最早包括語言學、歷史學、民族學等等，現在已經超越既有學科體系，而成為「跨學科式整合方法」（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菅野卓雄，1999：2）。該所創立之後，很多研究機構（如文學部）也陸續接受以一國為單位的區域研究視角。現今主要研究指針為：1.東亞的社會變動與傳統文化的社會人類學研究；2.中國與周邊民族的交流與變遷；3.亞洲各地方的社會變動與比較文化研究（教育宗教等）；4.日本文化對亞洲社會的貢獻；5.現代化與文化變遷研究（以國際企業為中心）。（吉田辰雄，1999：9）

[27] 在 1966 年開始區域研究正式進駐了大學的文學部，山本認為「以國家為單位研究《歷史學的領域》，認為缺少文獻研究，而使得這種方法有所缺失。」（山本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又擔心新研究方法的政治性。這種對問題意識的反省要求也影響當時對區域研究方法的觀感，甚至認為區域研究本身道德上有問題。如上原的批判：「美國現代區域研究就是把一國當作地方來研究，貫徹美國的區域地方化政策，甚至是想永久支配低開發國家的心理。」（幼方直吉，1966：141）以及宇野重昭批判「區域研究追求科學性的結果，使得研究有與中國的現實分離之虞。」（佐伯有一、加藤祐三，1965：726）中可以看出，當時日本學者對於將中國視為區域研究對象的主張[28]，一直無法完全的接受。[29]而不接受的理由，又幾乎都含有強烈的道德與動機意義，從這一點上可以發現當時已經進入主體建立的過程。

學界不只是採取上述區域研究的系統理解，更進一步引進了「比較政治」的方法。1967 年日本歷史學界由美國引進了比較政治的研究方法（市川健二郎，1966.12：90-98）被認為是對「除馬克思主義之外別無思想」的史學界帶來突破。（護雅夫，1967：697）比較政治作為研究方法，不需要討論被比較者的邊界與完整性，這個東西是作為研究者與讀者的共識而先驗存在，是在既存秩序下的研究觀念，同時也有強化現有秩序的感覺。1970 年代比較的範圍由國家擴展為文化，日本學界在 1971 年提出了比較文化論解釋「世界史要如何把握？」。主要來自於服部之聰提出「為什麼亞洲諸國中，印度成為殖民地，中國是半殖民地，日本卻能獨立？」這個問題，而主張要研究「中日韓比較史的認識」（尾藤正英，1972：900）主要的突破有兩點：首先再度解析馬克思主義中的亞細亞觀念，不再滿足於西方慣用理論的套用，其次要再一次辨明近代化論中「日本比中韓優越」的假設。日本即使把亞洲當作整體觀念加以

郎，1966：507）

[28] 而文革前更被批判為「缺乏帝國主義思維模式、缺乏階級支配觀點、菁英史觀」等等缺失。（佐伯有一、加藤祐三，1965：725）

[29] 一直到 21 世紀，對當時意義下的區域研究，都不甚諒解：「是以近代世界的再編為前提，擁有戰略的目的而出發的，就連美國的區域研究，都有這種強烈的傾向。」（原洋之介，2003：11）此處的「再編」，容易讓人聯想到非和平的意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但也開始正視亞洲內部的差異性。在 71 年時大學中最新的學科即為「比較文化研究科」，被認為反映的是史學界對「史觀、研究方法、研究態度」的反思。（山本達郎，1981：27-8）

綜上所言，部分學界對於主體性的思維採取客觀科學態度從事區域研究，比較政治甚至是比較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的開展，採取價值中立的方式，其中問題主體的存在性就不證自明，甚至被刻意省略。但是雖然在比較與客觀研究上學界與研究者得以迴避自身何在的問題，但是並無法向別人說明自己的存在，可以說其自我關照的心理並沒有完全被滿足。於是當時的日本，在文革來臨時找到了另一波的主體成就路徑。

肆、學術社群的自我批判浪潮

從 1964 年開始，日中兩國簽署「日中記者交換協定」，使得日本人能夠親自看到中國（之前是只能引用西方媒體報導[30]）。（山根幸夫，1983：503）這樣一來，能直接接觸到中國，使得支持社會主義中國的族群大為振奮，也使得文革的一手消息能直接傳達到日本[31]。在此一背景之下，前節所敘述之對於主體性認識的要求，也從文革與毛思想中，找到了可以正面主張的論述，而與當時的社會運動一起成長。文革中的毛思想要求藉由不斷自我批判來證成自我，從而每個人都必須藉由對過去自我歷史的檢驗，來重新認識自己。這種主張為主體性的要求帶來了一種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思維，「對現在的中國理解而言，所謂的專家沒什麼用……專家的看法太過於狹窄，反而是不專家的人能說到重點。」（竹內好，1972。引自田中正俊，1968：525）也把主體建立的權力下

[30] 詳情參考《新中國年鑑 1967》（中國研究所編，1967）
[31] 當時的持續交流，更使得中國青少年有機會訪問日本。據野澤的回憶，當時在中研的會議中，中國青少年報告攻擊黨中央的經過時，對當時的列席者都帶來了很大的衝擊。（野澤豐：1998：1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放給學生，可以看到在學運與思潮的發展中，學生意識都扮演重要角色，甚至教授在道德上也必定要回應學生問題（石田米子等，1969：2）。當時的重要問題有：「大學是不是封閉的？中國研究是不是一種古董趣味？年輕人是不是不感興趣？」這些問題。（高橋孝助等，1968：757）這波浪潮與 1968 年 9 月到 1971 年 9 月中國本土發生的「鬥批改浪潮」（高尚斌，1994：64）的時間點幾乎吻合，而在形式上也多有相似之處。

初期對文革的評價是正面的，1968 年田中正俊引用筑摩書房《講座中國》中竹內好的發言，歸納出當時中國研究的背景：一、受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國交未恢復、日中共分裂、美國的越南戰爭中對後進國的輕視影響，日本人對中國觀感不佳。二、日本人的中國觀是片段的，而且有意識形態過重之嫌。三、與其說是對中國的「知識」問題，不如說是對中國的基本態度問題。因此呼籲，對文化大革命不能採用「卑俗的權力鬥爭史觀，而必須對中國大眾有信賴與希望。」（田中正俊，1968：525）而且當時主要大眾雜誌也陸續對革命立場發表評論：「長征と出エジプト」（「長征與出埃及記」，住谷一彥，1967：33-61）與「現代中国と政治認識の問題」（「現代中國與政治認識的問題」，福田歡一，1967：33-61）等對於革命有著正面與積極的看法。

對東京大學而言，1969 年的大學鬥爭事件，使得研究幾乎停擺。當年環繞反戰與文革影響，主要的思路都集中在對戰後「民主主義與近代化」思維做出反省，強調「人民」（非專家）的地位。如當年的歷史學研究會的主題是「帝国主義とわれわれの歴史学—国家と人民」而歷史科學協議會則是「アジアの変革のおける国家と人民」。不僅對於學問「所為何來？」做出質問，更對研究者的動機、研究制度做出討論，無疑的是當時重要的轉折點。而具體而言主要的反思有「日本本土研究理論的發展？」與「研究理論對於全體社會的位置？」

日本學術社群的重要面向則是社會活動，在 1969 年的「現代世界における研究者」（現代世界中的研究者）座談會中（石田米子等，19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0）提出了中國研究者與學生、學問、大學、課題四個面向的關係。學生的自主團體在羽田鬥爭、日大鬥爭、東大鬥爭時以中國問題為槓桿來質問日本社會，比如說林彪的「人民戰爭論能否適用在日本？」等等討論。而這些都是研究者有義務要回答的（石田米子等，1969：2）。這樣一來與其說是對社會的關懷，不如說是「研究者被迫要將問題意識放在現在，不能只追求學術系統中的合理完整性，而更多要回答與現在日本的關係。」也就是西順藏主張的「觸摸魂的學問」（石田米子等，1969：6）。背後的意味就在於學術更進一步與社會連結。連結的方法就是在各種研究會、學會之中與群眾接觸。因此次年 1970 年代對於中國研究的回顧中，「有批判能力與否？」變成了當時中國研究社群的關鍵問題。而受到文革的帝國主義批判影響，當時的中國研究者對於自我定位與美日關係的反省，召開了「中国研究者の造反と自我批判」座談會（Selden，1970：17-25），目的在於「藉由探討日本中國研究的目的，來考慮現在日本中國研究的現狀」（Selden，1970：17）。文中認為 1950 年代末期福特財團以政府力量為後盾，把價值觀與利害關係輸入日本，「收買學者」使得日本學界長期敵視中國的情形這二十年來情況都沒有變化。（Selden，1970：17）反面來說，波多野認為日本在戰後缺乏敗北的認識，使得日本中國研究者在 1945 年之後雖然想要反省，但卻缺乏「方法論和新的問題系統」（Selden，1970：22）。當時這個研討會被認為是學界自我批判系列的高峰，引起巨大的迴響。

代表性的還有《講座日本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套書，其中五篇論文中的四篇，都是直接討論學術倫理學的問題，其中包括了戰後到當時歷史學作為學科的倫理學基礎的面向以及檢討帝國時期中歷史學為政治服務的性質，與提倡民眾史、抵抗史的研究視角（中村正則，1971：3-54）。以及社會科學概念與歷史學的關係，包括量化、理論化、與其他學科連結、實證研究作為方法論的正當性。（金原左門，1971：55-96）以及對於歷史教學制度與國民意識的反省（山田昭次，19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73-200；佐藤伸雄、梅田欽治，1971：201-250）。這些文獻都由當時活躍的歷史學者所撰寫，不斷強調從「課題設定開始，就必須注意到學問的社會意義。」（荒井信一，1971：1）學問的社會意義放在知識社會學的面向之中，就是回應了研究主體建立的需求。

綜上所述，隨著文革進行的白熱化，日本學界從兩方面呼應這個趨勢：一方面將學術建立的方法「由下而上」，將學生的地位提高，並且認為學術也能從大學鬥爭中生成，甚至激進者完全不要學術只要社會運動。二方面則是道德意義完全處於優位，所有的研究成果必須有社會意義，更進一步要對之前的論述否定，也就是在主體性上不斷反省的功能。在這一波社會／學術運動中，學界承受了文革思想的重要核心，而沒有相應的社會政治動盪；也就是說，日本學界成為革命思想輸出的主要繼受國。在這些批判立場中，研究者不斷的在問自己「做中國研究的目的？」，意義在於處理自身（做為國家與個人）相對於中國的關係，是文革前期自我批判的特色。也就是說，在這一階段主體性的處理方法，是對於自身存在的意義加以詢問。但雖說如此，當時研究者只能以「複製」中國的批判態度所建立主體的脆弱面，到中國文革轉向時就完全被暴露出來，尤其是中國自身陸續否定文革之後，更讓這些支持中國的研究者幾乎失去立場，但也只有如此，才能建立真正的主體性。

伍、後文革時期的學術主體性

文革所帶來的批鬥否定觀點，也同時提醒了學界要有自身的立場，更增進了學界的主體性意識。如隨著批鬥劉少奇，否定劉少奇在之前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的經濟功績時，日本學者也順便發現這種中國的建設發展也並非如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藍圖一樣完美，而是充滿了嘗試錯誤，甚至對於學界之前對劉少奇的讚美產生懷疑。日本學界漸漸接受將中國放在一個理性的政治體系中做判斷與預測，意味著脫離討論與中國的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係而試圖以普遍性來遠視中國，代表了主體性認識的一種階段。與此同時，中國被比擬於傳統封建中國的文獻也漸漸出現，以「東洋学から見た毛王朝」（宮崎市定等，1967：40-47）為代表，以「王朝史觀」來推論現在的中國，將中國比擬封建帝國[32]在當時的日本是很罕見的。甚至具體主張「（中國研究）太過與研究對象密著而失去批判的空間，也缺少方法論的訓練。」（高橋孝助等，1968：757-758）依照此一評論，戰後日本學界常有將中國過度美化的傾向。

從學術社群間對於文革的看法與後來的演變，也能窺諸其中主體性思考的痕跡。竹內好作為文革支持派的代表，在《アジア學の展開のために》[33]（竹內好，1972）的總論中表示「世界最先進的文明國是中國……這種文明觀能夠成為對近代歐洲文明變與自我反省的基礎。」（竹內好，1972：14-15）與竹內好同時代的中國研究者對文革分為支持與批判兩派，而幾乎沒有中間的立場；但相較之下，年輕世代中反而很多採取「文革懷疑派」的主張。主要的舞台（期刊）分別是：文革支持派有野村浩一在《世界》、批判派丸山昇在《文化評論》、懷疑派竹內實在《中央公論》。（野澤豐，1985：8）三者的立場鮮明，尤以表現在 1972 年的批林批孔運動評價之上。丸山對此評價為「十分複雜而令人奇怪」的現象；而竹內實則是將此運動理解為「周恩來引退劇」中的「國王與旗下派系間權力鬥爭」；野村則是將此運動上升到「一舉突破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的三重歷史根源，也就是文革的的頂點，全新的解放」。（野澤豐，1985：8）也就是說，從對於中共重大政治轉折的態度中，就可以看出學術社群逐漸朝向各個極端發展。

[32] 一直到現在很多流行的「反對中國」論述中，將中國比喻為是封建王朝、帝國的形象，完全忽視民國的共和制度與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

[33] 本書以每月一企畫的方式呈現，分別為：「總論－名與實－語言、華人社會－祖國、村－共同體、都市－人工的空間、音樂－感性的世界、民間信仰－民眾與神、國家－近代化的意義、文學－內與外的世界、技術－亞細亞主義－脫亞與興亞、十五年戰爭－善意與侵略之間。（竹內好，19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文革後期[34]，尤其是 1971 年林彪事件之後，文革支持派無法以理性說明（甚至是以前正確而後來被鬥爭的人物與政策，如：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只能緊抓者中國的任何行為並賦予更強大的道德意義。以批林批孔運動為代表，支持者固然依舊以道德絕對優位來說明，但是也意味著失去主體性，然而反對者與懷疑論者則已經逐漸跳脫這個脈絡。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前期（甚至 AF 事件時）採取高度批判立場的年輕的研究者群體，也逐漸轉為懷疑論或客觀研究論者，在將來的十年摸索期中可以看出這個群體的努力成果。與前期的「自我批判」運動做出比較，發現後期的論述中，比較不針對主體性做發言與反省，而是轉為對中國文革中的變化形式正面批判。甚至可以說是由於中國文革劇烈的鬥爭形式，使得支持者漸漸無法自圓其說，因此在「林彪（日本毛派十分支持的對象）反革命」最後到「四人幫逮捕」之後，可說是徹底使日本文革熱情幻滅。（姬田光義，2000：24）甚至文革結束後的《歷史決議》，讓很多這一代學者對自己從前的熱誠轉為失望，而停止研究。文革使中國研究界分裂，同時也造成支持文革學者因為中共 11 屆 3 中的轉向而斷然絕筆（川島真，1998：128）。

陸、結論

1962 年的 AF 事件，帶來了對美國甚至是近代主義的批判，造成史學界的廣泛再檢討風潮。日本學界從 AF 事件以來對主體性的反省需求，延伸到文革時期帶來自我反省的思維運動，造成了日本研究主體性

[34] 文革的階段劃分，大致上在中國的立場中將文革認為是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10 月，其中分為三個階段，一、1966 年 5 月到 1969 年 4 月的九大；二、九大到 1973 年 8 月的十大；三、十大到文革結束。由《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辭典中》揭載，也是學術界對此的一致劃分。（高尚斌，1994：63）這也造成了日本中國研究界的幾次學術變動，在變動的過程中逐漸脫離原有認識框架的過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決定。在以往的文獻研究中，往往將文革視為日本中國研究的負面因素，不只造成學術社群的分裂，同時也因為中國政治的混亂與轉向，使得很多學者對社會主義失望而離開中國研究界。但本文想要指出，在這些負面因素之外，文革帶給日本研究界的正是對中國重新思考的機會，甚至是對日本主體的「再定位」契機。再定位過程並不一蹴可幾，而是耗時十年，甚至可說是處理了日本戰後一直停滯的主體反省。

本文從主體性的立場來對日本「文革浪潮」加以闡釋，其中一條脈絡是科學與客觀主義所推至的「區域研究、比較政治、比較文化」系譜，藉由與被研究者疏離而不問自己所在，但在道德方面與當時的氣氛不合，因此成為思想界的非主流；另一條脈絡則受到毛思想的影響，以自我批判與社會運動實踐來確定自身。尤其在每一次文革的政治風向轉折，都帶來了研究者必須再一次反省自身跟隨中國的立場是否正確，也就使得中國研究者逐漸意識到自己主體研究的重要。也就是中國學者所評價：「文革暴露出的事實，不僅完全違背了肯定文革的人士的期待，也大大超出了否定文革的人士的想像。而且，研究人員發現，中國的問題也不是從文革開始出現的，而是早已有之。」（何培忠，2002：111）也就是說，文革對於日本研究者的意義並非固定，而是在歷次事件中都有改變。總之，若是要把文革理解為讓日本學術界派系對立激化的促進劑，則更應該認為文革不僅在思想上帶來了自我批判主體性思維，也在中共歷次的政治鬥爭中，強迫日本學者檢驗自身的主體性。伴隨著文革與日本國內的大學鬥爭所展開的「所謂舊權威與正統性的正面挑戰。」正是作為主體性建立所必要的叛逆期。

於是，主體性的建立逐漸從一開始對於自身研究動機的自我批判，演變成為文革後期能夠直接面對中國的研究，背後的意義是從關注「我與中國的關係為何？」轉變為直接研究「中國是什麼？」，這樣的轉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者就能夠面對中國，成就自己的主體性。[35]從這個觀點出發有之後對於「一次性認識」的強調，主張以實際接觸（田野調查）代替文獻資料的解讀分析，提倡使用傳記方法，而認為這樣能解決日本當前學術與現實疏離的問題。（山本達郎，1981：27）而在現實的歷史中，這樣的主體性建立的步調，隨著文革意外變動與研究者離世而過渡成為戰後第二代研究者的主要思維。

本時期的主要歷史意義，在於將日本學界藉此理清了 AF 事件以降「社會運動與學術研究」的形式，而在改革開放改變中國研究只能依靠官方資料[36]的狀況，而重新以有另一層次的主體形式來研究中國。隨著研究人員以各種方式交流的增多，直接的往來成為可能，之後出現了一段「中國現狀熱潮」，進展到 1980 年代開始藉由對亞洲的思考而再次躍上舞台。尤其表現在冷戰結構崩潰與世界秩序重組的過程中，此時日本圍繞自身的定位問題，也漸漸開始將亞洲作為重要的問題區域，試圖重新加以構築。（子安宣邦，2004：57）日本在 21 世紀的今天，面對中國／亞洲也必然要面對主體性的問題，但現在必須更多的與其他國家對話共同參與互相的主體性建構，也是現今東亞歷史對話的重要意義。

[35] 正如石之瑜的研究指出：「日本知識界能不為中國而研究中國……，則自然中國就不在日本內部，日本也不在中國內部，中國與日本之間就成為津田左右吉追求的相互異別化關係。這樣的中國認識不為了任何人，是屬於世界的視角。」（石之瑜，2007：5）

[36] 伊藤認為在「戰後的冷戰構造下，研究（尤其是中國研究）受到政治的直接影響，對於中國自身的激烈變化有醒目的報導之外，由於資料不足，尤其是統計數字的不正確，只能停留在現狀介紹之上。」（伊藤一彥，1990：3）因此意識形態激化的形勢也此不無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資料

日文文獻

Selden, Mark, 幼方直吉、戴国輝、小島麗逸、加藤祐三、波多野宏一（1970）〈座談会：中国研究者の造反と自我批判〉，《朝日ジャーナル》，1970 年 3 月 8 日，頁 17-25。

久保亨、江田憲治（2006）〈現代〉，礪波護等編，《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發行，頁 264-289。

小島優編（1996）《日中両党会談始末記：共同コミュニケはどうして破棄されたか》，東京：新日本出版社。

山本達郎（1965）〈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4 卷 5 期，頁 497-501。

山本達郎（1966）〈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5 卷 5 期，頁 505-508。

山本達郎（1981）〈あるアジア史研究者の歩み〉，《アジア文化研究》，13 期，頁 33-46。

山田昭次（1971）〈歴史学と歴史教育〉，《講座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173-200。

山根幸夫（1983）〈現代：戦後の日中交流とわか国中国現代史研究の背景〉，山根幸夫編，《中国史研究入門》，東京：山川出版社，頁 488-539。

中村正則（1971）〈現代民主主義と歴史学〉，《講座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3-54。

中国研究所編（1967）《新中国年鑑・1967 年版》，東京：極東書店。

市川健二郎（1966）〈比較社会構造論—アメリカから見たアジア史の把え方〉，《東洋学報》，49 卷 2 期，頁 90-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1966），《歷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歷史学の方法とアジア》，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田中正俊（1968）〈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7 卷 5 期，頁 524-527。

田中正俊（1968）〈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7 卷 5 期，頁 524-527。

矢沢康佑（1962）〈現代東洋史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1 卷 5 期，頁 669-675。

石田米子、西順藏、野原四郎，〈現代世界における研究者〉，菅沼正久等編《講座現代中国》，東京：大修館書店，1-30。

石島紀之、山下米子（1964）〈中国をめぐるライシャワーの「新しい歷史観」〉，《歷史評論》，169 卷。

伊藤一彦（1990）〈日本の中国研究〉，安藤正士等編，《現代中国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頁 3-53。

吉田辰雄（1999）〈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創立四十周年を迎えての回顧と展望〉，《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34 期，頁 4-9。

宇野重昭（1964）〈アメリカにおける現代中国研究の動向〉，《アジア研究》，11 卷 1 期，頁 3-16。

竹内好（1972）《講座中国.1》東京：筑摩書房。

竹内好（1972b）〈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真の友好へ人民の大行進を〉，《朝日ジャーナル》，14 卷 54 期，頁 4-10。

竹内好編（1975）《アジア学の展開のために》，東京：創樹社。

住谷一彦（1967）〈長征と出エジプト—毛沢東思想と使命予言の現代的意義〉，《展望》，102 期，頁 33-61。

佐伯有一、加藤祐三（1965）〈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4 卷 5 期，頁 725-7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佐藤伸雄、梅田欽治（1971）〈国民歴史意識と歴史学〉,《講座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201-250。

尾藤正英（1972）〈歴史理論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81 卷 5 期，頁 508-512。

里井彦七郎（1967）〈東洋史近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6 卷 5 期，頁 741-753。

金原左門（1971）〈社会科学の諸理論と歴史学〉,《講座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55-96。

原洋之介（2003）〈アジア学の方法とその可能性〉,東洋文化研究所編，《アジア学の將來像》，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1-33。

姬田光義（2000）〈中国革命與中国革命史研究について〉,《現代中国研究》，第 7 期，頁 16-27。

宮崎市定（1967）〈東洋学から見た毛王朝（座談会）〉,《中央公論》，82 卷 4 期，頁 40-47。

柴田三千雄（1977）〈総說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86 卷 5 期，頁 497-499。

荒井信一（1971）〈序〉,《講座日本史 10 現代歴史学の展望》，東京，岩波書局。

高橋孝助、古慨忠夫、安井三吉（1968）,〈東洋史近現代回顧と展望〉，《史学雑誌》，77 卷 5 期，頁 757-767。

国分良成（2000）〈建国 50 年—中国研究と中国近現代史の再検討〉,《北大法学論叢》，51 卷 4 期，頁 1390-1419。

野沢豐（1985）〈アジア研究の戰前戰後〉，歴史学研究会（編）,《アジア現代史》東京：歴史学研究会，頁 4-36。

野沢豐（1998）〈回顧と展望〉,《現代中国研究》,第 3 期，頁 101-118。

菅野卓雄（1999）〈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創立四十周年を祝して〉,《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34 期，頁 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福田歡一（1967）〈現代中国と政治認識の問題〉，《世界》，255 期，頁 25～52。

歷史学研究会（1962）〈フォードアジア兩財團の資金供與に關する史学研究会総会の決議〉，《歷史評論》，143 期，頁 24。

蠟山芳郎（1966）〈殖民地獨立の時代と日本〉，幼方直吉、遠山茂樹、田中正俊編，《歷史像再構成の課題》，東京：御茶之水書房，頁 85-124。

護雅夫（1967）〈東洋史総説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76 卷 5 期，頁 696-701。

中文文獻

姬田光義（1967）〈現段階における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の視角〉，《史潮》，100 期，頁 201-209。

子安宣邦，趙京華譯（2004），《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山室信一（2004）〈面向未來的回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編），《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部，頁 13-31。

川島真（1998）〈近年中國史研究的變化〉，《台大歷史學報》，22 期，頁 125-136。

石之瑜（2007）〈退出中國—近代日本對華思想中的普遍性方法與政治正確性問題〉，《中國大陸研究》，50 卷 1 期，頁 1-8。

何培忠（2002）〈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1945-1976〉，《國外社會科學》2002 年第 4 期，111-112。

高尚斌（1994）〈關於文化大革命劃分的淺見〉，《黨史研究與教學》120 期，頁 63-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嚴紹璗（2005）〈戰後 60 年日本人的中國觀〉，《日本研究》2005 年第 3 期，頁 1-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elf-examination to Upright: Culture Revolu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Japanese China-studies Community

Hsuan-Lei Shao**

Abstract

Since the Ford Foundation event in 1962, Japanese China-studies community started to notice thoughts on the identity of academic community.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thoughts transformed to become the epiphany of the community's self-criticism and Marxism. This article examined academic discussion and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 identify" to explore the philosophy of

** Hsuan-Lei Shao Ph.D.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NCCU. Research field： East Asia politics, China study. Address： No.64, Sec.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TEL：0911899262. E-Mail：93260505@nc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ina-studies back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iod are reflection of self identify in ontology, and entering the life of researchers through social movements. Moreover, the mean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inconsistent and changed over time. Researchers shifted their focu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o “what is China” and hence established their own identi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the history from the Ford Foundation event in 1962 to the re-evaluation movement in the late 1970’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eak of socialism in Japanese China-studies community. It will also be beneficial to understand Japanese Nationalism.

Keywords: Culture Revolution, Genealogy, Modern China Studies, Post-war Japan, Subjectiv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